



1987年的《沈丘县志》称“解放前沈丘县没有图书馆”。这样的定论显然过于唐突。其实，也就在这部县志记述乡绅杨敬堂先生的条目中，已经闪现出旧时沈丘县图书馆的踪影。该条目说：杨敬堂的父亲生前曾精心抄录项城县荆布老人的诗稿《彤短集》。1929年，杨敬堂先生将《彤短集》铅印成书，分别赠送沈丘、项城、淮阳三县图书馆和各界人士，以表示对先父的崇敬和思念。这说明，沈丘县在1929年已有图书馆。

1930年初，省督学祁晋卿视

沈丘“大众图书馆” 点燃抗日救亡薪火

察沈丘，对这所图书馆——中山图书馆有详细的记录。他说，这个县的“教育经费异常支绌，对于社会教育未能兼顾”，除了中山图书馆，“社教成绩，无大表现”。他又说，“中山图书馆，以城隍庙改设，书库楼房三间，尚宽敞整洁；馆内一切布置，亦颇整齐”。他还罗列了藏书及管理情况：“旧籍有四部备要一部，新籍应有者初备，所有图书，共值洋一千九百余元，搜罗颇为宏富”；“馆员孔繁荣，任事尽心，编号分类，亦均合法”。他也提出了一些改进业务的意见，认为“应将每日到馆阅书人数，随时登记，每届月终，列表公布一次，以资比较”。由此可见，这所图书馆规模初具，只是运作还不很规范。

至1931年，沈丘的社会教育有所推进。这一年，民众教育馆虽未分设各部，但已委任馆长（鲁士俊），落实年经费960元；图书馆也扩展到4所，除中山图书馆，其它3所为设于区镇的小型民众图书馆，经费总额为540

元。至于这两类社会教育机关后来的情况，由于缺乏资料，无法详述。

旧时沈丘的公共图书馆事业，除了县办的中山图书馆，还有一所更有影响的民办图书馆——“大众图书馆”。

1934年暑期，在外地读书的回族学生李俊、李端返乡度假。他们的家乡在紧邻安徽的一个大集镇——“槐店”。他们邀约本地社会青年，共40余人，组织“青年业余读书会”，继而采取搜集、捐献等办法，汇集进步书刊2000多册，在镇上“天乙阁”办起“大众图书馆”，内设阅览室。暑假结束，李俊、李端等人返校，“大众图书馆”由本地青年轮流当值，供民众读书看报。

1936年，“大众图书馆”的抗日宣传引起当局疑惧。是年，则以扩建颍滨中学为名，强行扒掉“天乙阁”，致使“大众图书馆”失去馆舍，被迫关闭。

1937年，李俊完成中学学业，回到家乡（沈丘县槐店镇）。这一年，日寇从濮阳一带渡过黄

河南侵。他曾就读的河南省立第四中学的所在地淮阳，也在这年9月5日沦陷，男女学生及公务人员140余人惨遭杀害。义愤填膺的李俊和旧日“青年业余读书会”的骨干，四处奔走呼吁，最终在黎明女子学校旧址恢复了“大众图书馆”。他们置办了流动图书车，走街穿巷，一边服务民众读书，一边揭露侵略者的暴行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后来，李俊改名苏荻，长期奋斗在党的宣传文化战线。

日本侵华期间，沈丘是河南县城未曾沦陷的两个县之一，也是公共藏书基本上未曾中断的少数河南县份之一。解放后，人民民主政权于1949年4月在县城创建图书室。沈丘县城后来迁往“槐店”，图书室也随之迁移，以新县城之文昌阁为地址。

因此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沈丘县先后诞生中山图书馆和“大众图书馆”。后者的运作，不仅显现了进步青年传播知识的热情，而且为当地民众点燃了抗日救亡的薪火。（李佳）

资政大夫刘汉儒

刘庆同

(接上期)

下面详述刘汉儒的一些故事。由于刘汉儒历年政绩突出，得到首辅张居正和皇上朱翊钧的赏识。朝廷将刘汉儒调浙江任按察司使。他工作有方，未久升任浙江右布政使。

万历十年二月，浙江杭州发生兵变。这时，刘汉儒挺身而出，惩办首恶，迅速平乱。未久，刘汉儒任浙江巡抚。

从至元二年至明洪武二十九年，正是日本处于南北分裂时期。于是一些武士、浪人、商人便进一步组织成强大的海盗集团，多次在中国沿海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骚扰。虽经戚继光、俞大猷四年的艰苦抗倭而平息，但这些倭寇事隔数年，听说戚继光被调走，便又在福建沿海卷土重来。福建当局，抗击不力，朝廷又调刘汉儒任福建左布政使。莅任后，经一番策划，他亲自组织和指挥军民，抗击倭寇，又在莆田、荔城等地一连几次胜仗，将倭寇击败。刘汉儒不愧是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之朝廷重臣。平乱后，稳定了社会秩序。但刘汉儒终因操劳过度成疾，上表准奏返里休养。

刘汉儒离闽在家休养之际，云南发生了“缅甸之乱”。朝廷自张居正死后，日趋腐败，中央财政又拿不出钱来。刘汉儒就是在国家危难之秋，带病赴任的。莅任后，他一面组织军民抗战，一面清理财政。首先，组织军民拿起武器抗敌侵略。而后境内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或与汉族之间的矛盾，坐下来谈判。刘汉儒一方面整治贪官，罚没赃款，另一方面勒令这些霸主补交银税。这样既解决军费不足，又鼓舞了士气，也解决了少数民族与政府及汉族之间的矛盾。这一策略的实施，断绝了境内与缅甸的联系，终于息战火、宁边关，受到朝廷嘉奖。

刘汉儒因一生操劳过重，于万历三十一年病逝，享年74岁。经明思宗皇帝恩准，于崇祯7年准入“乡贤祠”春秋祭祀，还特为刘汉儒建“增寿寺”以享民间香火。

刘汉儒是一位生性刚正不阿，清正廉洁的高官，亲民爱民的好官。民间建祠塑像，地方入“乡贤祠”，朝廷建“增寿寺”，人虽去而精神犹存。

(注：三世参知，以往写为刘汉儒、刘汉杰、刘汉俊弟兄三人，是错误的，现根据清乾隆十一年《沈丘县志》记载：应更正为三世参知，刘汉儒、刘东、刘刘祖孙三代。)

周口关帝庙完成第三期修缮工程

■晚报记者 王晨

昨日，关帝庙第三期全面修缮工作已经结束，施工人员正在加紧铺设路面和台阶。关帝庙博物馆馆长王丽亚说，在这次维修中，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脊饰文字、一处券门和窗棂等遗迹，这些新发现对研究周口关帝庙的建筑风格极具史料价值。

周口关帝庙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于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建成，历时159年，占地36000平方米，是周口旅游胜地，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国家3A旅游景区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关

帝庙年久失修，仅于1955年和1966年进行过小规模修缮。为恢复关帝庙原貌，保持建筑风格，经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审批，我市文物部门日前对关帝庙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。修缮分三期，一是拆除违章建筑，二是维修主体建筑春秋阁及东西仪门，此次三期工程维修的范围是前、中院东西廊房及药王殿、灶王殿、财神殿、酒仙殿等。

修缮前期，施工人员在修缮春秋阁时，发现紧靠东西廊房北墙处，有两个被封死的青砖券门，并在东券门外发现一口古井及古建筑根基。此次修缮中，施工人员又从

东西廊房拆下的正脊和垂脊中发现很多文字、诗词等内容作为脊饰安装排列的顺序。如前院西廊房每块正脊扣瓦处都有一个字，依次排列为“门前车马非为富，家有诗书不为贫”，字体为楷书，每字5厘米大小。正脊上还写有“天下太平”“国泰民安”等内容。关帝庙博物馆馆长王丽亚说，文字内容寓意深刻，代表着古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，同时也教诲后人重视文化知识，树立正确财富观。

在东廊房北山墙发现一处券门，是该院内保存完好的传统工艺。至于该处为何有一券门，而西廊房没有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在中院西看楼后檐南二缝梁架处，有明显沉降现象，直接影响维修质量。工作人员在查找原因过程中，发现腔内柱子局部被火烧毁。木柱通高8.1米，直径0.28米，其上1.42米处的柱子被火烧毁，长度达2.3米。目前工作人员正在进一步查明原因。

关帝庙博物馆馆长王丽亚说，这一系列新发现，对于研究周口关帝庙古建筑群的历史变迁具有很高的实证价值。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准备在古井上面修建一座玲珑别致的六角亭，设计图纸已完成，建成后将成为关帝庙内一处新景观。

廉洁爱民的太康县主簿蔡高

■晚报记者 张洪涛

蔡高（1014年—1041年），字君山，福建莆田仙游枫亭人。他是北宋名臣蔡襄的胞弟，比蔡襄小两岁。

蔡襄于1030年登进士第，次年任漳州军事判官，蔡高也于1034年登进士第，授任长溪（今霞浦）县尉。长溪地处福建沿海，当地有许多百姓以打渔为生。一天，一位老妇人来到县衙门告状，诉说她两个儿子出海捕鱼，失踪多日，怀疑是遭仇人所害，请求为她捉拿凶手。由于没有证据，县吏感到为难，便问那老妇：“你没有见到儿子的尸体，如何能断定儿子被仇人杀害呢？再说海上风大浪急，也有被掀翻船只葬身大海的可能。”这妇人听了，号啕大哭，仍一口咬定儿子

是被仇人所杀。蔡高察看了这妇人的神色，觉得她确有冤情，决定受理此案。他安慰并送老妇人回家后，暗中到老妇指控的那个仇人家微服私访。之后他又到海边巡查，一连六天毫无收获，直至第七天早上，终于看到有两具尸体随潮水漂来。他忙叫人把尸体打捞上来，正是老妇人的两个儿子，经检验是他杀。于是蔡高传唤差役拘捕那个嫌疑犯。凶手供认不讳，受到伏法。

又有一天，有对夫妇来到衙门击鼓诉状，哭诉儿子在家被入室盗贼杀害，请求缉拿凶犯。蔡高分析此案凶手必是同村人，对被害者住宅熟悉，便集中村民逐一排查。他通过观言察色，发现一村民神色不对，言语不符，疑点很多，再经过深入调查，终于确定那人就是嫌疑犯，就传令拘捕审讯。那人只好供

出杀人真相，蔡高又把他处决了。这两件命案的侦破，使蔡高的声誉日隆，人们无不称赞他断案神明。

后来蔡高升任开封府太康县主簿。蔡高任太康主簿时，其兄蔡襄与欧阳修同为馆阁校勘。蔡高因不时去蔡襄寓所，有幸结识了欧阳修。他和兄长蔡襄一样，都十分敬佩欧阳修的人格和文学才华。他在一首题为《谒馆阁校勘欧阳公》的诗中写道：“此日登史阁，高风孰可追？学期明主佐，道许后生师。余岂能自信，公真不我欺。微躬讵所厚，惭愧异新知。”此诗赞颂了欧阳修的高风亮节，又为自己能得到欧阳修的厚爱，成为知心朋友而感到三生有幸。

北宋康定二年（1041年）六月七日，京师发生大疫，蔡高不幸染疾，卒于太康任所，年仅28岁。他

英年早逝，留下一男二女，而妻子程氏才20岁，生活非常清苦，无钱办理丧事。太康百姓及其亲友募捐200两白银欲为其夫办理丧事，程氏却哭道：“我家的人做官素来廉洁，决不能因为办理丧事而玷污了我的丈夫！”她始终不肯接受。蔡襄闻讯，亲作《祭弟文》悲悼亡弟，又整理蔡高的数万字遗稿，发现皆是记述朝廷的要点。后来这些遗稿为朝廷制定兴利除弊决策提供了依据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蔡襄为其弟蔡高归葬请铭，欧阳修撰写了《蔡君山墓志铭》，称赞蔡高“敏于为吏，廉洁爱民，是天下奇才”，并对蔡高的英年早逝深表哀悼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与蔡高的深情厚谊。

(资料提供：程俊松)

